

世界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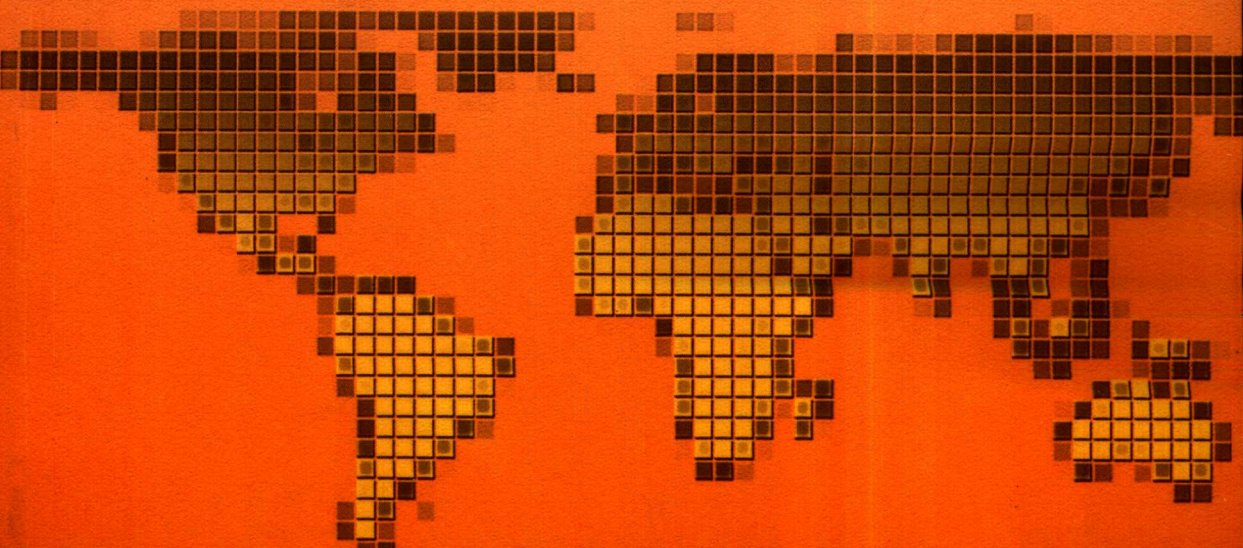
研究

齐世荣 © 主编

SHIJIESHI

YANJIU

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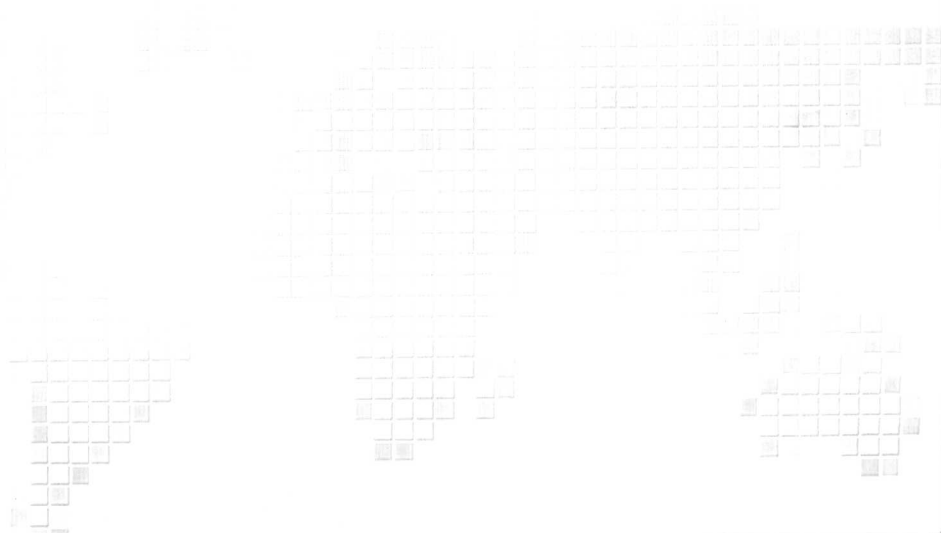


世界史

研究

齐世荣 © 主编

人民出版社



序

这本世界史文集从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史教师的论文中选了18篇,汇为一集。文集的内容不集中于某一时代,也不集中于某一领域,而是采取“大拼盘”的办法,从古到今,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以供读者选阅。

论文集的作者包括老、中、青三代,以体现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史学科薪火相传的历程。学术的生命力在于创新,但创新的基础和前提条件是继承。可以说,没有继承,就谈不上创新。在学术研究中,“平地起高楼”的事情是没有的,也是根本不可能的。但只有继承,而无创新,学术的发展就会停止,学术就会丧失生命力。“发前人未发之覆”,是一切科学工作者都应当追求的目标。恩格斯说:“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它的实际应用也许还根本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而当他看到那种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立即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非同寻常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二版,第3卷,第777页)而马克思本人,就是在科学史上一位最具有创新精神的大师。恩格斯说:“马克思在他们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同上书,第

776 - 777 页)。特别是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和剩余价值,而由于“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这两个伟大的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同上书第 740 页)。我们希望每一代新人都向马克思学习,勇于创新,不断攀登新的科学高峰。

世界史在中国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起步较晚,我们又是这门年轻学科中的一些初学者,论文中的缺点和错误,敬希专家和读者不吝赐教。

齐世荣

目 录

(Contents)

| | |
|--|---------------|
| 雅典首席将军考辨 | 晏绍祥(1) |
|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Leading General of Athens" | Yan Shaoxiang |
| 论中古西欧“上帝的和平”运动 | 施 诚(30) |
| "The Peace of God" Movement in Medieval Western Europe | Shi Cheng |
| 圣职推荐权与教士的职业生涯 | 刘 城(43) |
| The Right of Recommendation for the Holy Position and the Professional Life of the Christian Missionary | Liu Cheng |
| 英国都铎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 | 王乃耀(61) |
| The Development of Commodity Economy in Tudor Period | Wang Naiyao |
| 都铎王朝的经济立法与英国近代议会民主制的起源 | 刘新成(83) |
| Tudor Economic Legislation and Origin of Modern British Constitution | Liu Xincheng |
| 英西战争(1588—1604年)中的英方政策评价 | 夏继果(109) |
| An Appraisalment of the Policies of England in Its War With Spain 1588 - 1604 | Xia Jiguo |

- 也论柏克 王勤榕(124)
 A New Reappraisal on Edmund Burke Wang Qinrong
- 简论吉伦特国民公会的党派之争 王燕平(139)
 On the Power Struggle Between Girondins and Montagnards in
 the Girondins Convention Wang Yanping
- 美国西部野马的驯养、使用与保护 周 钢(151)
 The Taming, Use and Protection of Mustang (Or Wild Horse) in
 West America Zhou Gang
- 德意志帝国时期妇女群体的崛起 邢来顺(175)
 The Rise of Women Social Group in the Period of German Empire Xing Laishun
- 土耳其海峡与1907年英俄协约 赵军秀(191)
 The Turkish Straits and Anglo - Russian Convention of 1907 Zhao Junxiu
- 美国公司的现代化进程 程文进(210)
 Modernization of American Corporations Cheng Wenjin
- 对俄共党内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斗争的再认识 康 泠(223)
 A Re - understanding of the Struggle Within the Russian
 Social - Democratic Labor Party (Bolshevik) in Regard
 to the Treaty of Brest - Litovsk Kang Ling
- 竞争与妥协:巴黎和会上的美英关系 韩 莉(243)
 Struggle and Compromise: the United States and Britain at 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 Han Li
- 公众舆论与政府决策 梁占军(258)
 ——1934—1935年英国“和平投票”的政治影响
 Public Opinion and Policy - making of Government:
 the Political Influence of the Peace Ballot in the UK,
 1934 - 1935 Liang Zhanjun
- 论英国对意大利的外交政策 齐世荣(273)
 (1936年7月—1938年11月)
 The British Foreign Policy Towards Italy from July 1936 to
 November 1938 Qi Shirong

关于 1940 年美英“驱逐舰换基地”协定的历史考察 …… 徐 蓝(310)

The Destroyers Deal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United
Kingdom in 1940

Xu Lan

20 世纪下半叶西方史学认识论的发展 …………… 何 平(337)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Historical Epistemology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He Ping

雅典首席将军考辨

晏绍祥

国内很多世界古代史及古代希腊史的专门著作,每当谈及雅典民主的局限时,一般都要涉及雅典的十将军制,它们大多认为:“工商业奴隶主阶级垄断了将军职位,伯里克利就连续 15 年以首席将军而控制了雅典政府。因此政权实际上是掌握在工商业奴隶主等公民上层人物手中,农民和手工业者并不是这个民主政治的真正主人^①。”新近出版的、在国内很有影响的高等教育出版社的《世界史—古代史编》上卷基本承袭了这一观点,书中写道:“在体制上,雅典民主政治也留有一个‘漏洞’以便于这些上层分子掌握实权,那就是十将军始终保持选举制,连选连任,并不给薪俸……伯里克利就是从公元前 443 年起到(公元前)429 年连选连任首席将军而控制了雅典政局,成为事实上的终身政府首脑^②。”李天祐撰写的、可能也是惟一由中国学者完成的《古代希腊史》认为,“自公元前 443 年到前 429 年,伯里克利斯(即伯里克利)一直连任十将军委员会的首席将军,为雅典最高的领导者^③。”最近出版的一本《世界古代史》在这方面似乎走得更远,把修昔底德所说的“雅典名义上是民主政治,权力实际上逐渐掌握在第一公民手中”,修改成了“雅典名义上是民主政治,但事实上权力是在第一

① 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上古部分,人民出版社 1973 年第 2 版,第 218 页。

② 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古代史编上卷,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63 页。

③ 李天祐:《古代希腊史》,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12 页。

公民(首席将军)手中”,把首席将军与第一公民等同了起来,理由是十将军委员会的“首席将军兼管军事、外交和财政,威望之高近似国家元首^①”。

上述这些论著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伯里克利连续 15 年担任雅典首席将军一职,而且似乎认为,在雅典宪法中,至少是从伯里克利以来,本来就有首席将军的头衔。一般当选为首席将军者,都是当时雅典最有影响的政治家,其实际地位相当或者近似于国家首脑。可是,在叙述伯里克利以后雅典的历史时,这些著作似乎又都忘记了雅典还有首席将军,无论是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影响很大的尼西阿斯、克列昂和阿克比阿德斯,还是公元前 4 世纪的德莫斯提尼,在这些著作中从来没有被称为首席将军。仿佛首席将军一职在伯里克利时突然产生,随着伯里克利的去世,又突然从历史上消失了。同时,在中国学者撰写的另一些世界古代史著作中,并没有出现首席将军的提法。如林志纯先生在提到伯里克利时,只说在修昔底德被流放后,“伯里克利每年当选为司令官(即将军),始终是政府的领导者^②。”陈同燮的《希腊罗马简史》也说,“伯里克利……连续被选为将军,长时期掌握着雅典领导权^③。”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中,我们也没有见到首席将军的提法^④。那么,雅典宪法中是否有首席将军一职?上述论著多限于陈述自己的观点,均未详细讨论雅典是否有首席将军一职问题。

在国外学者的相关著述中,有关雅典是否设立过首席将军一职也

① 米辰峰主编:《世界古代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21 页。

②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古代史及中世纪史教研室古代史组编:《古代世界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203 页。

③ 陈同燮:《希腊罗马简史》,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73 页。

④ 《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 I,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44 页之“伯里克利”条称,伯里克利从“公元前 443 年起当选将军,历 15 年,在雅典内政、外交等方面起了决定性作用”。

存在争议,只是这些争议都集中在伯里克利时代。早在19世纪后期,贝洛赫就已经指出,从公元前441—前440年以来,雅典将军的选举制度发生了变化。除了9名将军按照部落选举外,另有一人是从全体雅典公民中选出的。这个从全体公民中选出的将军享有高于其他9名同僚的权威^①。布劳尔多以修昔底德关于萨摩斯战争和伯罗奔尼撒战争初期的记载为依据,认为修昔底德在10名将军都在场的情况下,特别点出伯里克利是当年的将军,说明伯里克利确实拥有高于其同僚的权威。他特别援引修昔底德著作的第2卷的第21节作为证据,认为伯里克利“率领或者不率领军队出战的能力……暗示他拥有某种类似最高权力的东西……想从这样一种关于雅典事件的描述中推导出严格的同僚平等的观点,需要高度的想像力”^②。易言之,伯里克利确实是雅典的首席将军。但是,对这种观点持反对态度的也大有人在。苏联科学院主编的《世界通史》声称,“伯里克里斯(即伯里克利)很受广大公民界的欢迎,从公元前443年起,年年当选为‘将军’^③。”但仅此而已,并没有说明他有什么特殊权威。《牛津古典辞典》的“伯里克利”条中,也没有提到他曾经是雅典的首席将军^④。西方大学中非常流行的两本希腊史教科书:伯里的《希腊史》和哈梦德的《公元前322年以前的希腊史》,都不曾有伯里克利是首席将军的提法。伯里虽然承认伯里克利享有高于其同僚的权威,但认为那是因为“他对享有主权的人民的道德影响力,他有能力说服人民做他认为有益的事情”。从

① Debra Hamel, *Athenian Generals: Military Authority in the Classical Period*, Mnemosyne Bibliotheca Classica Batava Supplementum, Brill, 1998, p. 85.

② Edmund F. Bloedow, ‘Pericles’ Power in the Counter-Strategy of 431’, *Historia*, 36 (1987), pp. 9-27.

③ 苏联科学院主编:《世界通史》,第2卷上册,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50页。

④ N. G. L. Hammond & H. H. Scullard, eds. *The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 Clarendon Press, 1970, 2nd edition, pp. 800-801.

宪法上说,他只是10名将军之一^①。丰纳拉对雅典将军制度进行过深入研究,他承认,雅典将军的选举制度确实发生过变化。但选举制度的变化并不意味着某些将军的权力也有变化,因为在雅典,曾经有两个部落在同一年中同时有两人当选为将军的情况;公元前432年,有一个部落有两人当选为将军,另一个部落甚至有3人当选。在这种情况下,谁是首席将军?所以,选举制度的变化和个别将军权力的大小之间没有联系^②。多尔从另一个方面否认了雅典有首席将军的观点^③。波德勒基本赞同丰纳拉和多尔的观点,认为伯里克利较大的影响不是源于宪法上的地位,而是他的道德影响力^④。此外,首席将军一职的存在,好像还成了雅典不够民主的一个象征,直接影响到对雅典民主的评价。因此,对与首席将军有关的问题,很有深入讨论的必要。

十将军初设时并无首席将军一职

雅典十将军的产生,是克里斯提尼部落制度改革的必然结果。尽管有关改革的许多细节仍存在巨大争议,但学者们一般承认,克里斯提尼改革后,雅典民主政治的基本制度大体形成。在叙述有关改革措施时,希罗多德的重点放在部落制度上,并未提到设立将军一事^⑤。这

① J. B. Bury & R. Meiggs, *A History of Greece to the Death of Alexander the Great*, 4th edition, St. Martin's Press, 1975, p. 240; N. G. L. Hammond, *A History of Greece to 322 BC*, 2nd edition, The Clarendon Press, 1967, pp. 331 - 332.

② C. W. Fornara, *The Athenian Board of Generals from 501 to 404* (Historia Einzelschriften 16), Steiner. 转引自 Debra Hamel, *Athenian Generals: Military Authority in the Classical Period*, pp. 85 - 86.

③ K. J. Dover, 'ΔΕΚΑΤΟΣ ΑΥΤΟΣ',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80 (1960), pp. 61 - 77.

④ Anthony J. Podlecki, *Perikles and His Circles*, Routledge, London & New York, 1998, pp. 162 - 163.

⑤ Herodotus,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A. D. Godley,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William Heinemann Ltd., 1928, V, 66, 69 - 70, 78.

倒并不奇怪,因为希罗多德意在强调克里斯提尼与他外祖父之间的相似之处,对政治制度的细节历来不太关心。而且从年代上来看,十将军似乎并非克里斯提尼创造,因为《雅典政制》告诉我们,“首先,在这些制度建立后的第五年,即赫耳摩克勒翁担任执政官的那一年,他们指定了五百人议事会的就职宣誓仪式,这到现在仍在使用。其次,他们开始按部落选举将军,每部落一人,但全部军队仍归军事执政官统帅^①。”虽然有关将军产生的具体年代存在很多争议^②,但《雅典政制》的记载仍明确地告诉我们,将军最初产生时,是按照部落选举的,每个部落一名。关于将军的职责和相互间的权力分配,《雅典政制》没有做具体说明,但克里斯提尼改革的基本目的之一是打击贵族势力、增强雅典国家的统一^③,因此,不大可能在这10名将军中产生一个首席将军,引起不同部落之间的竞争和国家的动荡。我们可以相信,10名将军的权力是平等的。此外,作为一种新设置的官职,虽然是选举产生的,但在其潜在的力量表现出来以前,杰出的人物是不会对它太感兴趣的。出任将军一类官职的,可能也是那些比较一般的人物。历史事实是,对公元前490年以前的雅典将军,我们几乎一无所知。希波战争以前雅典那些杰出的政治家中,如地米斯托克利、米太雅德^④等,大多是先出任执政官,然后才出任将军的。《雅典政制》还告诉我们,将军最

① Aristotle, *Athenian Constitution*,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H. Rackham,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XXII, 2 - 3.

② 《雅典政制》的记载在年代上出现了一些矛盾,尤其是关于赫耳摩克勒翁担任执政官的年代。参看 P. J. Rhodes, *A Commentary on the Aristotelian Athenaiion Politeia*, Clarendon Press, 1993, pp. 262 - 263.

③ M. Ostwald, *Nomos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Athenian Democracy*, Clarendon Press, 1969, pp. 137 - 173.

④ 地米斯托克利是公元前492年的名年执政官,米太雅德是公元前524年的执政官,见 Matthew Dillon and Lynda Garland, *Ancient Greece. Social and Historical Documents from Archaic Times to the Death of Socrates*, Routledge, 1994, p. 107.

初产生时,并无统帅军队的全权,他们需要服从军事执政官的领导^①。

希罗多德关于马拉松战役的记载,说明《雅典政制》的记载也许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当波斯军队在马拉松登陆时,希罗多德告诉我们,雅典的将军们在派使者去斯巴达求援的同时,率领军队赶到马拉松与波斯军队对峙。在是否立即进行决战的问题上,雅典将领之间的意见是不一致的。“将领们的意见既然分歧而错误的意见又有占上风之势,于是米太雅德就到这个人(指当年的军事执政官卡里马库斯)那里去”,游说卡里马库斯的支持。卡里马库斯支持了米太雅德的意见,同意作战。从米太雅德的话看,在将军们难以取得一致、没有任何一种建议可以赢得多数支持时,军事执政官似乎拥有最后的决定权。可是希罗多德随后告诉我们,雅典人所以决定作战,是因为“加上了军事执政官的一票”,言下之意,是说军事执政官与雅典将军一样,只有一票的表决权。同时,希罗多德还说,在战场上,雅典军队是由10名将军轮流指挥的。果如此,则军事执政官不过是个荣誉职,没有实际的统帅权。但是,在实际的交战中,军事执政官占据右翼,即传统是由战场统帅所处的位置^②。所以,希罗多德的记载显然自相矛盾,历来学者们对此也有许多不同的解释。但在笔者看来,在缺少相关资料的情况下,考虑到希罗多德历来对有关宪法的细节问题粗枝大叶^③,经常出现一些不够准确的记载,我们宁愿相信《雅典政制》,把10将军看做军事执政官的下属。希格内特指出,“将军委员会当时只是个咨询机构,军事执政官勿需遵从他们的建议。如果是这样的话,则他的权威肯定高于他们,是实际上的总司令;因此,在战斗中占据右翼,即传统上由国

① Aristotle, *The Athenian Constitution*, XXII, 2.

② Herodotus, VI, 105, VI, 109 - 111.

③ 例如,他说(VI, 109)军事执政官是由抽签选举产生的,然而, Aristotle, *The Athenian Constitution*, XXII, 5称,执政官是从公元前487年开始由抽签选举的;他还说克里斯提尼改革是模仿他的外祖父,更加让人难以相信。

王占据的位置^①。”至于希罗多德所说的轮流指挥问题,虽不是没有可能,但如果军事指挥权掌握在军事执政官手中的话,那么这个当值将军的职权也许不过是主持将军们的会议,并在会后向军事执政官报告情况而已。这些情况说明,至少到马拉松战役时,将军在雅典还没有取得突出地位,在军事上,他们还是军事执政官的下属。所谓首席将军,在当时不可能存在。

希波战争后期雅典将军影响的增强

马拉松战役后,将军的影响增强了,指挥制度也出现了重大变化,在战场上轮流指挥的做法似乎不再流行,至少不再被强调^②。突出的表现是,公元前489年,米太雅德独自统帅着一支庞大的舰队前去攻打帕罗斯^③。公元前480年,为了应对薛西斯的入侵,雅典全城大搬家,所有能够服役的公民都登上了战舰,抗击波斯军队。希罗多德给我们的印象是,海军统帅一直由地米斯托克利担任。普鲁塔克则说地

① Charles Hignett, *A History of the Athenian Constitution to the End of the Fifth Century BC*, p. 171; Debra Hamel, *Athenian Generals: Military Authority in the Classical Period*, pp. 79-83.

② 关于将军影响增强的原因,学者们一直比较重视公元前488/487年雅典执政官选举制度的改革,认为执政官改由抽签担任后,其威信下降。此外,提洛同盟建立后,与波斯的战争一直在进行,战事频繁,外交日趋重要,掌握军权的将军地位自然会有所上升。这些或许都是正确的。但米太雅德公元前489年远征帕罗斯的事例说明,将军的影响在执政官选举制度改革之前已经有增强的迹象。所以,将军权威加强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马拉松战役的胜利主要是在米太雅德指挥下(或者是在他的建议下)取得胜利的。战斗结束后,当波斯人企图从法列隆海湾登陆偷袭雅典时,在军事执政官阵亡的情况下,雅典的将军们及时率领军队,赶在波斯人之前到达了这里,成功地挫败了波斯人的阴谋,从而大大提高了将军们的地位,使雅典人认识到,即使没有军事执政官的统帅,他们同样能够在战场上取得胜利。既然雅典人能够因为国王们的懦弱而设立军事执政官(Aristotle, *Athenian Constitution*, III, 2),应当也会在觉得不需要军事执政官为统帅时,直接让将军们来统帅雅典军队。不过这一切都是推测,有待具体资料的佐证。

③ Herodotus, VI, 132-135.

米斯托克利是总司令^①一类的人物。在希腊盟军商讨作战方针的会议上,也一直是地米斯托克利代表雅典发言,其他将军几乎成了摆设。公元前479年,阿里斯提德当选为“拥有全权的将军”,成为驻守普拉提亚的雅典军队的统帅^②。后来,阿里斯提德还曾当选将军,并且代表雅典人与盟国宣誓,厘定盟国应交纳的贡金数量。在他之后出任将军的西门,无疑是希波战争后到公元前462年间雅典军事和政治中的风云人物,将军在雅典政治中的影响与日俱增。但此时雅典是否产生过人们常说的首席将军呢?这需要我们对此时雅典政治上几个风云人物的地位进行一些分析。

先看米太雅德。由于马拉松战役的胜利,米太雅德成了雅典的英雄。希罗多德说,“自从波斯人在马拉松战败之后,在雅典本来就有声望的米太雅德的声望就更加提高了。”于是,他向雅典人要求70条船,说是“如果他们追随他的话,他会使他们发财致富”。雅典人同意了。但在进攻帕罗斯的战斗中,米太雅德遭到了失败,本人也受了伤,一事无成地回到了雅典。他的政敌立刻以欺骗雅典人民的罪名控告他。雅典人虽未将其处死,但罚了他50塔兰特^③。希罗多德没有提到雅典人授予米太雅德任何称号,甚至没有说他是当年的将军。考虑到马拉松战役的影响以及雅典的制度,可以设想,米太雅德次年顺利当选为将军而非军事执政官,而且在10名将军中应拥有更高的威信。但是,在出兵问题上,他要取得雅典人民的同意;如果行动失败,他必须承担由此引起的后果,没有任何特殊权力可言。因此,米太雅德不可能是

① *Plutarch's Lives*,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Bernadotte Perrin,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Aristides*, 8, 3, William Heinemann Ltd., 1928, 原文是 σ υ μ ε ν α ρ χ ω ν κ α ι σ τ ρ α τ η γ ω ν, 意思是“你是拥有统治权的将军”。

② *Plutarch's Lives, Aristides*, XI, 1. 原文是 σ τ ρ α τ η γ ω ς α ν τ ω κ ρ α τ ω ρ, 意为“拥有全权的将军”。

③ *Herodotus*, VI, 132 - 136.

掌握雅典内外政策的首席将军。

接下来是地米斯托克利。希罗多德相当详细地记载了他在希波战争中的行动,并对其所发挥的巨大作用赞不绝口。他促使雅典人建造了庞大的舰队,正是这支舰队在撒拉米斯打败了波斯;他正确地解释了德尔斐的神谕,说服雅典人撤退到撒拉米斯和伯罗奔尼撒,与波斯人在撒拉米斯进行海上决战;在希腊同盟的大会上,他舌战群雄,成功地让希腊盟军留在撒拉米斯,并诱使波斯人在不利的地理条件下与希腊舰队决战,成为希腊取胜的头号功臣。其他的雅典将军,似乎没有出现在希罗多德的笔下,至少其作用不够明显。这是否意味着雅典人赋予地米斯托克利以特殊权力呢?希罗多德没有明说,但提到雅典人选举地米斯托克利为将军,对其具体职权语焉不详^①。普鲁塔克借阿里斯提德之口,称地米斯托克利为 archon kai strategon^②。这个词组的前半部分是执政官、统治者之意,后半部分为将军,因此,洛布古典丛书的英译者把它翻译成 commanding general,以示其与众不同。在另外一处,普鲁塔克称地米斯托克利为 strategoutos autokratoros。洛布古典丛书的译者将其翻译成“general with sole powers”,意思是“拥有全部权力的将军”,以强调其地位的特殊性^③。如果事实真是如此,称地米斯托克利为首席将军也许并不过分。可是,普鲁塔克的记载不是没有疑问的。首先,希罗多德给人的印象是,地米斯托克利一切都按照雅典法律办事,所有行动都是在得到雅典人同意后才进行的^④,没有表现出任何特殊的地方。雅典的其他机构,如战神山议事会、五百人议

① Herodotus, VII, 173. 希罗多德用的是动词 στρατηγῶ,意思是“成为将军、选为将军”,因此可以把这句话理解成雅典人选举地米斯托克利为将军。

② Plutarch's Lives, Aristides, VIII, 3.

③ Plutarch's Lives, Aristides, VIII, 1.

④ Herodotus, VII, 143 - 144, 173.

事会等,仍在正常发挥作用^①。其次,普鲁塔克关于希波战争的主要资料也许来自希罗多德的记载。但希罗多德只是说地米斯托克利是当年的将军^②。在阿里斯提德和地米斯托克利关于波斯人即将进攻希腊人的对话中,根本没有涉及各自所担任的职务。对话着力表现的,是两个历来敌对的人,为了希腊的事业而捐弃前嫌,共同对敌。复次,普鲁塔克的习惯是,当他引用某一段资料时,会交代资料的来源。但在这里,他并没有说明其资料的来源。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第一处是以对话形式出现的。普鲁塔克写作时,距希波战争已近700年,对这一类的话,不能毫无批判地接受^③。如果考虑到在普鲁塔克所写的地米斯托克利本人的传记中,并没有出现他当选为雅典全权将军的提法,我们就更有理由怀疑普鲁塔克有关记载的真实性。因此,所谓拥有全权的将军的说法,也许只是普鲁塔克的想像;或者是为了抬高阿里斯提德的道德形象,有意创造出来的,因为人们公认,普鲁塔克对历史准确知识的追求,远不如他对道德说教的偏爱^④。最后,即使地米

① 据 Herodotus, IX, 5, 五百人议事会仍然负责接待外邦使者,并就是否接受对方的建议进行讨论;据 Aristotle, *Athenian Constitution*, XXIII, 1 当将军们束手无策时,是战神山议事会给每个雅典人分发 8 个德拉克马,使雅典人顺利完成了撤退。在这两件重大的事情上,没有任何地米斯托克利参与的迹象,如果说他当时是拥有全权的将军,这样的情况是不可想像的。

② Herodotus, VIII, 79.

③ 郭小凌:《古代的史料与世界古代史》,载《史学理论研究》2001 年第 2 期,第 89—90 页。

④ 汤普森说,“应当把普鲁塔克看做一位道德家,而不应当把他看成历史家。”郭圣铭称,“普鲁塔克主要是个道德家……他所写传记,都是通过具体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来宣扬他自己的伦理思想,以求达到教育的目的。正因为如此,他就不完全遵守作为一个历史家所必须具备的谨严的笔法,有时凭主观想像,抒发胸臆,并且不惜引用一些未经考证的传说和奇闻逸事来支持他自己的见解。”郭小凌认为,普鲁塔克“同自己的描述对象有相当大的时间和空间差,主要靠二手史料填补这一距离,因而他把人物的思想心理刻画得越精致微妙,他可能离客观史实越发遥远。可以这样说,《名人传》中的人物无不带有普鲁塔克个人的影子,很大程度上是普鲁塔克心中的历史而不是客观的历史”。话虽过分,但与本文的观点不谋而合。引文见 J. W. 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第一分册,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第 159 页;郭圣铭:《西方史学史概要》,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57 页;郭小凌:《西方史学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08—109 页。